

編 序

十九世紀末日本的法律思潮在歐陸歷史學派的影響下，認為法律與日常生活之間不可脫節，否則無法有效的推行統治（劉斌雄 1975:9），在此思想的作用下，為了能順利統治臺灣，1901 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議成立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，並由他出任會長。1909 年因調查會內組織的第一部，對於漢人的法制調查近於完成，始增設蕃族科，其調查範圍不限於原住民族有關法制的固有習慣，舉凡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、生產方式、宗教信仰，以及神話傳說等皆全面調查，成果斐然，陸續出版成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（1913–1921）、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（1915–1920）及《臺灣番族慣習研究》（1918–1921）三套各八冊，另有《臺灣蕃族圖譜》二卷（1915）、《臺灣蕃族志》一卷（1917）。這些由官方權力機構主導的出版著作，多是集體性的調查報告，具有政治目的，作為總督府欲順利統治的理蕃政策參考。然而，由於報告書中調查的原住民地理區域涵蓋相當廣闊、資料數量龐大、圖文並茂，時間上也相當早（二十世紀初）；相對地，當今原住民文化迅速變遷，近年來積極重建其歷史與社會文化，這些記述已消失的傳統慣習之報告書，逐漸被視為珍貴的民族誌文化遺產。

又鑒於這些圖文經常被當作參考資料引用，國家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從 1982 年劉斌雄所長期間，開始推動此日文文獻的翻譯。1995 年徐正光所長在順益博物館的贊助下，正式出版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》第一冊編譯本，至 2004 年本所先後陸續完成整套書八冊的翻譯出版。接著於 2006 年起，民族所另開始著手當時最先出版的套書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的譯叢工作。2007 年黃樹民所長鼓勵編者延續志業，負責第四冊《紗績族》（今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）的翻譯與族語復原工作，雖然此族群所居住的南投與花蓮分別是編者的故鄉跟心靈故鄉（田野地），但編者熟悉的還僅是噶瑪蘭族與北部阿美，加上時值南投祖居地賽德克族正名運動的高峰，及其與花蓮太魯閣族之間因族名爭執不下的特殊時機。儘管如此，最後編者還是抱著學習的態度接下任務，卻未預見此工作的困難性、政治性、爭議性與（後／去）殖民性。

起始，編者朝如何將二十世紀初的日文「精確的」翻譯成現代漢文，並將報告書中大量使用片假名所紀錄的原語，找到今日該語群的族語教師，將之「復原」與轉換

成該語群所使用的書寫系統。但是當筆者開始閱讀余萬居先生中譯本初稿時，相當錯愕，驚覺問題不僅是從日文到漢文、片假名到羅馬拼音的翻譯問題，百年前調查報告書中所書寫的族群分類、地點、部落與人群是那樣的陌生、分歧與複雜，如今人、事、地已非。調查資料本身無法解釋自己，因為過去與現在的關連性出現非常大的斷裂。經由殖民者武力侵略、因政治或蓋水庫因素強制遷村、混居集團移住後的現在，阻礙我們對過去被調查部落在單一歷史情境下的理解。Derrida (1967) 曾提出民族誌文本像文學作品，需要被重讀與解構，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必須被解釋，卻又不能解釋所有，它存在於權力與解釋、過去與現在綿密交雜的網絡之中。

史學科出身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補助委員佐山融吉，1912 年始至台灣做調查(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編 2001)。他首先進行阿美族、卑南族及鄒族的訪查，之後 1916 年 9 月才開始進行祖居地南投賽德克族部落的調查，歷時約一個月的時間。結束後同年 10 月，緊接著進入花蓮移居族人的短期訪查。當時武官出身的臺灣府總督兼軍司令官佐久間左馬太，將此群體列為五年理蕃事業中的大案，因此在本書調查前的 1910 年起，因祖居地賽德克族人經常襲擊日警，又殺害日本私人會社的腦丁，雖然有設隘勇線戒備，日警聯合日軍仍進行三次武力討伐，以炮擊住屋強制繳械，要求歸順。當時此區域除了賽德克 Tgdaya 馬赫坡社 (Mehebu) 與鄰近的泰雅族福骨群 (白狗社)，仍未在日人的控制下 (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99[1914-1937])，其餘各社皆已棄降。另外，1914 年佐久間左馬太則下令，以警察與陸軍部隊聯合進軍花蓮太魯閣區域 (同上)，激起太魯閣抵抗事件。在佐山融吉進行此報告調查前，日本人不得其門而入，也只能派警在隘勇線外窺探敵情，但是在這兩次武力討伐後，殖民者的勢力已排除隘勇線，侵門踏戶地進入到零落的殘存者家中。佐山融吉的調查報告書正是殖民者與此族群，第一次面對面接觸所留下來的紀錄。有意思的是本報告書中完全沒有當時的社會脈絡或政治背景，僅針對諸項生活慣習做描述，這種去政治化的書寫方式，也許正好呈現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「觀看」與「被觀看」的權力關係，與殖民者特殊的監看方式。藉由報告書的生產，這些遭帝國軍警討伐後的區域與人群的日常生活，將進入皇威的全景敞視，從被排除邁向被同化。

佐山融吉如何在短短各一個月的時間，迅速地完成一百多個大大小小的社，三種語群加上又有祖居地南投、移居地花蓮間區域歧異的訪談調查工作？霧社與太魯閣地區對當時日人而言可謂山高路遠，交通與物資或人力支援極為不便，加上反抗事件頻傳，沒有充分的準備與心理建設，隨意進出這些區域絕非易事。在本報告書前言中，佐山融吉提及「承蒙地方廳的官員及蕃童教育所職員的賜便」，編者推測他仍須依賴

討伐前養成的族人通譯、駐在所警察與軍事幕僚。同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補助委員的平井又八，即在從事調查期間，於花蓮馬太安遭七腳川阿美族人獵頭。因此對日本人而言，佐山融吉是一個極受推崇披荊斬棘的先鋒者。他在調查會所收集的神話，與大西吉壽於 1923 年合著出版《生番傳說集》一書，與小川尚義、淺井惠倫合著的《原語臺灣高砂族傳說集》，堪稱研究臺灣原住民神話傳說的「雙璧」（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編 2001）。另外，大部份關於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的史料或研究調查資料，多集中在 1930 年的霧社事件前後，佐山融吉編著的此調查報告書，讓我們對此族群的歷史文化能有更多面向的認識，包含各部落詳細的遷移史、神話傳說、歲時祭儀與自治組織等。

不過經由強力討伐後，再派遣專家學者進入，這種特殊獲取報告資料的生產過程，從其報告書中可看出幾個問題。如多位族語復原教師指出，原日文書中原語的書寫前篇偏南投的德魯固語（Truku）化，後篇則傾向花蓮太魯閣語化（Truku），並非忠實地呈現當時各語群的語言差異。此外，報告書中僅紀錄「單字」或「片語」，造成原語復原的困擾，如 Tgdaya 族語教師郭明正提及「圓月」在調查中記為 *mtbale idas*，耆老們則認為該記為 *idas mtbale*；美女原為 *mbtunux mqedin* 有人則認為應記為 *mqedin mbtunux* 較妥。再者，從片假名所記錄的原語表達中，族語復原者觀察到，當時族人對日人還是有很深的猜忌與高度防備，在這種缺乏互信的緊張狀態下，行文中有些語詞產生誤解，特別是群體稱呼、親屬稱謂部份，或者是碰到禁忌時，族人答非所問。如前篇分類上將 Tgdaya（霧社蕃）稱為 Tevo（無義），此乃被遺忘的古語？還是通譯或是佐山融吉的誤解？我們不得而知。另外又提及 *bari mqeding*（結婚）原意為「買女子」，但這是賽德克族過去語言裡無法理解的用語，族人表示 *msterung*（相遇），才是「結婚」用語。還有，起源傳說「……Bnuhun 的地方，長有一棵『大樹』……」的書寫，讓部落耆老猶如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。郭明正推測當時受訪的三位族老應是以 Pusu Qhuni 來傳述賽德克族的起源傳說，因 Pusu Qhuni 是其始祖誕生之地。賽德克語 Pusu Qhunim 原是「樹根、樹頭」之意，指「樹」長出地面的根基部，實際上 Pusu Qhuni 是高約 90–100 公尺、最大圍徑約 60 公尺的巨大岩石，今稱白石山牡丹岩，是顆叢林中屹立的大岩石而不是大樹。透過今日族人的澄清，諸如此類的考證將放入譯本的附註中。

百年後本編譯工作邀請六位南投與花蓮不同語群的族語專家，共同參與討論與田野工作，再由他們尋訪部落耆老訪談，這些閱歷豐富的耆老對日文毫不陌生，他們幾乎可以直接由片假名來判讀各自語群的語彙。工作時若其中某人先判讀出屬於自己語

群的語彙時，其他人會以各自的語彙相呼應，再經討論確認後，才由熟悉書寫系統的原語教師，將該語彙記音登入。有時由族語教師將已復原的語彙唸出，再由他們來確認。如此反反覆覆、來來往往的工作過程，主要是尊重族人主體的參與及詮釋權。另外，將報告書中大量使用片假名所紀錄的原語，與其說「復原」，還不如說新編成該語群今日所使用的書寫系統，同時凸顯出今日各語群的差異。雖然原住民語言書寫系統推行多年，各語群系統間嘗試建立共識，仍有小問題存在，如南投賽德克族祖先的原音 l 及 r，隨著時間的變遷，今日多發為 n 的音，因此本書中採轉記為 n。還有，花蓮的 Tkdaya 與 Tawsay 跟太魯閣族 Truku 或阿美族混居而被同化，目前懂得此兩族語的耆老多已逐漸凋零，加上環境變遷，許多當時使用的語彙今已不再使用，因此「復原」工作雪上加霜，甚至柯真光校長很遺憾的坦承，調查報告書後篇有些 Tawsay 語彙根本無法「復原」。本書新編譯族語的做法，乃因不僅考量中文讀者而已，另外也重視原住民族語讀者的存在，特別是族人因外來政權的強力介入，造成的失憶傷害，在今日政治民主化後，內部正積極重建其民族記憶、傳統領域及文化復振，此報告書在其語言、歷史文化的傳承上，具有重要的工具意義。

另外，在當時《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》（原名《理蕃誌稿》）中也呈現出，殖民者採鉅觀的分類，將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視為泰雅族，因此調查報告書中仍呈現出此殖民者對異族的想像觀點，偶而論及其他泰雅部落的情事，或與之相提並論，因此當筆者與族語教師工作時，產生了族人無法藉由其地方知識「復原」的窘境，以致也必須請益於泰雅族長老。

然而，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乃在於涉及政治性、主客體權力關係的分類論述。藉由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從無知到全知的分類，「蕃族」才成為可理解與可支配的物象。佐山融吉主要調查風俗習慣，但是他卻認為泰雅族與賽德克族難以民俗做區分，當時體質調查未臻完善，所以就其自稱「人」之用語差異，為了編纂報告書之便，而以太魯閣 Truku 及韜賽 Tawsay 的共通語 Sejiq、Seejiq（人）=「紗績」（今稱賽德克）作為族名與書名。不過，臺灣總督府對原住民的治理規劃，並未使用佐山融吉的族群分類觀點。筆者徵詢各族語教師的意見，本想忠於原著保留紗績族（賽德克族）為書名，但 Truku 族語教師吳金成卻堅定地認為，遷移到花蓮的 Truku 是 Truku Truwan，Truku 是他們的源頭與根，應該稱為太魯閣族。1996 年起興起太魯閣族正名運動，族人自述乃基於族群互為主體的尊重、對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九項「國家肯定多元文化，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語言及文化」及第十項「國家應依民族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的地位及政治參與……」的詮釋，同時為避免被歸類在泰雅族下，太魯閣

人失去主體認同，淪為次邊緣人，再加上政府國家公園及土地開發政策下，族人也被邊緣化，於是集結以花蓮在地生活圈為族群認同的主體，而不是泰雅族為認同的主體（蔡豐念編 2006）。2004 年業經行政院通過核定，公告太魯閣族為臺灣原住民族第十二族。2003 年南投 Tgdaya、Toda 與 Truku 三群族人，曾要求政府暫緩花蓮太魯閣族片面正名，應尋求南投與花蓮有共識的族名（林修澈 2007）。Tgdaya 語復原者郭明正表示 Seediq/Sejiq/Seejiq Bale（賽德克·巴萊）直譯為「真正的人」，才是自主且具排他性的自稱。2006 年南投賽德克族積極發動正名運動，年底在南投平靜國小舉辦賽德克族 *mddahur* 和解儀式殺豬，彌平因 1930 年霧社事件引起的內部嫌隙，進而尋求內部共識與團結，凝聚賽德克族意識。2008 年中華民國政府以賽德克族之名，將之列為第十四族。百年來族群分類從殖民政治操控下所強加的想像分類論述，轉變到 1990 年代中期起民主化國家中，邊緣族群避免被持續邊緣化與捍衛其資源分配的手段。基於對族群主體與研究倫理的尊重，並讓譯本所調查之族群易於對應現行慣用稱呼，本書中譯本名為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。

本報告書是由余萬居先生初譯，前篇再由實事求是的東華大學語傳系簡月真副教授重新校譯，遇到古日語疑問時感謝奈良大學教授真田信治不吝指正。後篇是由本所經驗豐富的編輯黃淑芬負責，並且協助史料的查證。因初譯稿文言與白話交雜，還特別請作家郭昱沂潤稿。另外，工作團隊還包括花蓮太魯閣族的學生巴干·吉美先將報告書中的原語，細心地按照佐山融吉的分類，製成 Excel 對照表，再由族語復原教師修改，方便其與耆老的田野訪談工作及避免遺漏。筆者田調的訪談與每次工作會問題的討論，巴干都細心的整理成逐字稿，讓此譯本的註腳說明更清楚。感謝所內黃智慧前輩，提供關於佐山融吉的研究資料與編序的修改意見。也感謝助理陳永亮、所內同仁廖三郎及在林務局工作的 Toda 黃敏華在田野工作上的協助。

透過南投 Toda 伊萬·納威（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講師）的幫忙引薦，我們找到埔里高工退休教師郭明正（Dakis Pawan），負責 Tgdaya 語的復原工作；編者到部落的三次舊社實地田野多虧他帶領，他的傳統知識遠超過其實際年齡。南投清境國小校長詹素娥（Lituk Teymu）在百忙之餘，還要奔波拜訪耆老負責 Truku 語的復原工作。春陽 Toda 的溫黃輝芝（Away Nawi）更是帶領全家投入，其父黃白明（Awi Suyan）細心地將日文住屋圖重劃作成小抄，隨身攜帶以詢問友伴，共同回憶確認建屋結構的語彙。另外還要感謝平靜國小 Toda 蔡少聰主任、Truku 巫實美、柯美花及何徐繡菊等長輩在知識上的分享與協助。

後篇花蓮部份，Truku 文化工作者吳金成（Yuki Lowsing）負責內外太魯閣與巴

托蘭母語復原，累積語彙份量非常多；過程中其身體不適中風，編者曾想另覓他人，但最後還是由他辛苦的完成，其精神令人敬佩。透過萬榮國小 Truku 的胡永寶(Muyang Tadaw) 校長推薦，我們委請任教於同一所小學的楊正雄(Pawan Masaw) 主任，負責 Tktaya 語的復原工作，不過因熟悉 Tktaya 語特別是古語的耆老屈指可數，其田野訪查進行的過程相當艱困。Tawsay 語的復原由當時卓溪鄉崙山國小柯真光校長負責，他長期推動 Tawsay 語教學，與耆老們有相當好的合作默契，因此復原工作駕輕就熟。另也感謝柯校長之子恆潔，協助族語書寫校訂及提供田野照片。最後，再次感謝團隊所有的工作人員、辛勞的耆老與族語教師，還有所長黃樹民先生與前副所長朱瑞玲女士，對本翻譯計畫諸多關心與田野訪談工作的支持。希望藉由本書的出版，可以讓今日部落或都會區的族人，重新與百年前的調查資料建立連結，同時也讓社會大眾瞭解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過去至今變動的軌跡，以做為規劃未來發展的參考。

劉璧榛 謹識
二〇一一年春

參考書目

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会 編

2001 台灣原住民研究概覽：日本からの視点。東京：風響社。

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

1999[1914-1937] 日據時期原住民政志稿第二卷·下卷(原名理蕃誌稿)，宋建和譯。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
林修澈

2007 賽德克族正名。台北市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。

蔡豐念 編

2006 太魯閣族語簡易字典。花蓮縣秀林鄉：花蓮縣秀林鄉公所。

劉斌雄

1975 日本學人之高山族研究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40:5-17。

Derrida, Jacques

1967 L'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. Paris:Éditions du Seuil.